

社會學、人類學 在中國的發展

喬健 主編

新亞學術集刊・第十六期 1998

新亞學術集刊・

1993年10月5~8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集兩岸三地十數位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就「社會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舉行了一個小型座談會。他們的論文及發言整理（共十一篇）構成本書的基礎，編者又選入了八篇最近完成的相關論文。這十九篇文章代表了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界的權威學者對社會學與人類學在兩岸三地的發展及相關問題最全面與最新的論述。

本書出版經費由周君廉基金贊助，謹此致謝。



新亞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香港・沙田

新亞學術集刊

第十六期 1998

社會學、人類學在 中國的發展

喬 健

主編

©1998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版權所有 • 不得翻印

ISBN 962-8072-04-8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新亞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
香港 • 沙田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編輯說明

1993年10月5至8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響應梁秉中院長召開“小規模、高質素”學術會議的號召，同時乘「第四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在香港開幕之便，邀集了兩岸三地十數位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就「社會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舉行了一個小型座談會。他們的論文及發言稿（共十一篇）構成本書的基礎，編者又選入了八篇最近完成的相關論文，這十九篇文章代表了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界的權威學者對社會學與人類學在兩岸三地的發展及相關問題最全面與最新的論述。

最初發言稿的整理與論文的校訂由張小軍先生、陸緋儀小姐及謝靜雯小姐負責，全書最後的校訂與編排則由陳靜遠小姐擔任，謹於此一併誌謝。同時，編者更要感謝新亞書院提供本書出版經費以及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對本書最後的編印工作提供必要的協助。

作者簡介（按姓氏筆劃排列）

- | | |
|-----|---------------------------------------|
| 王思斌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 |
| 文崇一 | 原中央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
| 李亦園 | 中央研究院院士 |
| 李沛良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崇基學院院長 |
| 宋林飛 |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 |
| 宋蜀華 |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
| 金耀基 |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社會學系講座教授 |
| 馬戎 |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所研究所教授、所長 |
| 陳海文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 陳連開 |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教授 |
| 黃紹倫 |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 |
| 黃應貴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
| 黃樹民 | 美國艾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人類學教授 |
| 費孝通 | 北京大學教授 |
| 喬健 |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長 |
| 劉豪興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 譚少薇 |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

目 錄

略談我學習和研究中國社會學

與人類學的經歷和體會	費孝通	1
------------------	-----	---

回顧、現況與發展

論中國民族學研究的縱橫觀	宋蜀華	21
中國民族史研究的特點與發展三階段	陳連開	39
民族誌學與社會人類學：		
台灣人類學研究與發展的若干趨勢	李亦園	55
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	黃樹民	81
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與前景	喬 健	93
台灣人類學的現況與發展：		
評述與建議	喬 健 高怡萍	109

社會學、人類學與中國實際的結合

中國的社會學：國際化或國家化？	文崇一	159
社會學與本土化（發言稿）	文崇一	201
論社會學之傳統與中國化：		
後設社會學札記之三	陳海文	207
社會學與中國實際的結合：理論與現實	王思斌	237
中國化與國際化（發言稿）	黃紹倫	253
九〇年代初期以前香港的社會學研究	李沛良	257
人類學與台灣社會	黃應貴	287

社會學、人類學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

社會學與中國現代化（發言稿）.....	金耀基	345
結合中國現代化中的重大問題		
開展社會學研究	馬 戎	353
中國社區研究的發展	劉豪興	363
從鄉土社會走向鄉鎮社會：		
論轉型中的中國農村社會	宋林飛	413
個人與婦女：人類學對中國現代化研究		
的兩個切入點（發言稿）.....	譚少薇	439

略談我學習和研究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經歷和體會

199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座談會上的發言

費孝通

一

社會學是人們對社會有系統的科學思考。對於人同人的相處，怎麼處得好，這個問題的研討，我們在中國二千五百年前就已經很發達了。這幾年里我幾次去山東。山東正是我國戰國時期文化的中心。孔子家鄉，墨子家鄉我都去過了，荀子家鄉也去過了、莊子家鄉在河南我也去過了。我特別花了一段時間到淄博，淄博當時是齊國的首都，二千五百年前的城牆現在還能看到，這裡還發現一個齊某公的古墓，有殉葬的六百匹馬整齊地圍着墓地的四周。淄博這個齊國首都的西門就叫稷下，稷下有個學宮，是專門招待學人的，現在我們所說的「博士」，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稷下召聚的學人人們稱他們作稷下先生，地位較高的稱博士，我看到了稷下這個地方的遺址感慨很深。當時這裡有個風氣很盛行，這個風氣叫“不治而議”，讀書人不去執政，但要發表議論。國家養士，一養千把人，都是國家給錢，不要去找基金。假如所養的士感受到的待遇不夠好，他們可以起來發牢騷，也可以揮手而去。當年孟子就與齊國的統治者合不來，不願待下去，他要走，人家要留他，為他造了好多房子，讓他招幾十個學生，但是孟子還是要走，走的時候，主人還為他送行，派一個車隊，幾十輛車護送他走，表示尊重學

者，我覺得這種“稷下之風”很有意思。這是戰國的風氣。戰國為甚麼有這麼一種風氣呢？我想並不是哪個人特別有見識，提倡出來的，而是當時正逢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轉變的時期，正是這個社會變遷，形成了這種風氣。現在我們又遇到了一個相似的時期，不過範圍不是山東這一塊齊魯文化，而是全世界的文化。這也是一個「戰國」時代。昨天我們還在電視上看到在原捷克首都的武裝戰鬥，這樣一個時代也許要有幾百年，也許幾十年，一個避免不了的動亂過程。大家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怎樣活得下去？這個問題曾經引出像中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和百家爭鳴的那種局面。我有個感覺，現在正需要世界範圍的大眾對話，提各種看法來議論，來講，找出一個辦法來，使人類在地球上能夠活下去。當前一個大問題是：人，人類在地球上怎麼活下去。以前中國的問題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怎麼活下去，現在是全人類，大家都要考慮，人類怎樣在地球上活下去，這個問題是當前社會學應該思考的大課題。

這幾年來我思考的問題，已經超出了《行行重行行》，在《行行重行行》裡我是要回答一個中國農民如何解決吃飽肚子的問題，就是我們這塊中華大地怎麼來養活十二億人口的問題。現在我思考的問題是，這個地球怎麼能繼續把人類養活下去。這可不那麼容易，這個問題比中國人的吃飽、穿暖要困難的多。昨天在電視上所看到的打炮情景，這是真的在打，而這種局面還在蔓延，從捷克斯洛伐克起，現在已到了莫斯科中心。當前的世界狀況是，我們大眾在經濟上是離不開別人的了，那個國家的人想關起門來，享受桃花源中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了，自給自足的生活已經做不到了，經濟上大家都是彼此相連，綁在一起了，世界的經濟秩序已經形成。只要哪裡有波動，香港市場的股票立刻就表現出來，反應得多快呀。人在經濟上真是完全綁在一起的了。我們吃的東西，如我在新加坡，晚上吃的豌豆苗，就是當天早上從我家鄉運來的。這種蔬菜每天從我的家鄉由飛機運到新加坡，正如加利福尼亞供應整個美國的蔬菜與水

果一樣不是件奇怪的事。全世界的經濟已抱成了一塊，我們的政治也正在想抱成一塊。但，經濟秩序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體系，還是由一雙看不見的手把它控制在一起，還沒有一個人為的合理的組織使它朝着平穩的發展的道路上走。更看得清楚的是，政治上還走不到一起，歐洲共同體還搞不起來，現在看起來，是越來越困難了。這個一體不容易形成，因為最重要的是缺乏一個道義上的秩序，大家在對不對，好不好上，還是各有各的想法，而且很認真，覺得別人不對，就要開炮。這樣一個世界人心不安，因為道義的秩序（moral order）還沒有產生。

我認為人的社會有三層秩序，第一層是經濟的秩序（economic order），第二層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約（common contract），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層是大眾認同的意識，這個東西假定出不來，大概這個世界還要經過一個戰國時期，全世界的戰國時期。二十世紀我們是走過來了，還剩下沒有幾年快到二十一世紀了。對二十世紀，我所感覺到的是一個戰爭不斷的世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我們國內更是戰火不斷，到處有戰爭。二十一世紀是否是二十世紀的再版呢，我認為是不行了。再版下去，世界要完蛋了，不能再版，應當出現新的一個版本了。這本書應當包括上面所說的三個秩序合在一起建立起來。我們社會學要在第三個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為，這第三個秩序，即道義的秩序，是要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人同人相處，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樂業，大家對自己的一生感到滿意，對於別人也能樂於相處。我們必須造成這麼一個天下，這個天下要看在二十一世紀裡造得出來還是造不出來了。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以這個作為主要的軸心問題進行研究。所謂學問，說穿了就是各人的思考所形成眾人的議論，反應這種時代的各種想法，反應的方法可以不同，但各種反應都是時代的反應。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就會有新的反應。這些反應中也有很多規律，有繼承下來的，如科學的方法論，也有新的發展，而實際是要有一套想法，一套觀念，一套意識，我叫它心態。

心態是甚麼呢，我在清華學習時有個老師叫史祿國，他一生提出了個中心概念，大家不懂，叫 Psychomental complex，他寫了本大書，大家不見得看得懂，叫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我最近又翻出來看，還是看不大懂。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也很有用處，他講的大體上就是我所說的心態，講人的行為背後，決定行為的心理和意識的狀態，比普通所說的心理學的內容還要擴大一點，包括理性的價值判斷和藝術欣賞。所以我的老師造下這新名詞，叫 Psychomental complex 我把它叫做心態。因此，如果人們能有一個共同的心態，這種心態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看法，形成我所說的多元一體，一個認同的秩序（consensus order）。

這個思想我是在山東遊孔林的時候，突然有感而發的。人的思想有時是很奇怪的，往往是突然受啟發而悟到的。我在孔林兜圈時，突然意識到孔子不就是要搞多元一體的心態這個秩序嗎？而他在中國成功了，形成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中國為甚麼沒有出現捷克斯洛伐克及蘇聯這種分裂的局面，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而中國人的這種心態是怎樣形成的，漢族怎麼會形成這樣一個大民族，十一億人會形成這樣一種統一的“認同”（identity）？這不是偶然的，這不是一種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種具體的東西，影響深遠的東西，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形成了這麼一個“認同”，這樣一個中華民族。過去大家不覺得它的偉大，因為它的形成是最自然不過的，大家似乎在無意形成的。我們值得想一想，能否在整個世界上也能出現這樣一種認同呢？大同世界嘛。過去我們祖先所說的天下大同不過包括亞洲大陸的一部份，現在全人類五大洲能不能一起進入大同世界呢？這是社會學與人類學在二十一世紀共同要解決的大問題。

二

關於中國社會學的歷史，我知道得不多，好在最近幾年已經有人進行研究，而且寫出了專著，不僅大陸上有，香港也有。今天只想就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作一點補充敘述。

如果我們同意把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範圍放寬一些，包括人們對人際關係的知識和理論，那麼社會學的來源在中國就有很長久的歷史。我記得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有一次在燕京大學說過：他認為中國在戰國時代已有荀子開創了這門學科，比西方的孔德（A. Comte）和斯賓塞（H. Spencer）要早二千五百多年。不管我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們不容否認，對人際關係的重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在這樣長的歷史裡，這樣多的人口，對人和人相處這方面所積累的經驗，應當受到我們的重視，而且在當今人類進入天下一家的新時期的關鍵時刻，也許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將留到這次談話結束時再提。

把社會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來說，它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從西方直接或間接通過日本傳入中國的，略早於我出生在這個世界上，還在幼兒時期，我已經從我的父母口上聽到過達爾文（C. Darwin）、赫胥黎（T. Huxley）等外國人的名字。小學時期在父親的書架上看到過梁啟超、章太炎的著作，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也在其中。但是行文深奧，不是我這個讀書不求甚解的孩子所能理解的，甚至連這些書的名稱也莫測高深。

我幼時常聽長者議論嚴復其人。有謂嚴早年奉派留英學海軍，歸而不務正業，以譯書為事，實是未得其用，懷才不遇。事過百年重評再估，不能不體會到嚴氏的選擇具有其深意。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意識在社會演進中的關鍵地位。西方文化的勃興從表面上看是它的堅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礎實在還是在十九世紀的啟蒙思想，而《群學肄言》即是其中的一塊基石。他在譯本的序言裡說明，所謂群學就是用科學的法則來研究人類

社會的歷史發展，以預測未來。所謂肄言就是究其功用之所施，提出所以治之的方法。而且在〈譯余贅語〉中說：「竊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為變法維新開啟思想」。改革社會的風雲從此披靡全國，不能不承認嚴氏的遠見超眾。《群學》成為中國改革的啟蒙也是社會學的光榮。

嚴氏指出西方的社會學和中國傳統的儒學脈脈相通，可惜這見識沒有為後輩所重視。五四之後講述社會學的人幾乎都是以移植西學為主。更有甚者，在二十年代大學裡擔任社會學課程竟以西方學者為多。當我在1930年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時，以中國教授用中國語言講課的還屬開風氣之先，但是所用課本還幾乎全是英文。

可以作為中國社會學成長里程碑的是“中國社會學社”的成立，那是在1930年成立的。用中文編寫的社會學教材，最早可能是孫本文主編的社會學叢書15種，1931年合編成《社會學大綱》出版。1935年孫本文著的《社會學原理》一書，始被列入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為各大學所採用。從這本大學教材也可以看出當時各大學所教授內容的特點，那就是綜合美國大學裡各家的社會學教材而成，並開始採用少量當時可得的中國歷史及統計材料加以引證，基本上可說還是“土包裝的洋貨”。

事實上，我們這些當時的社會學學生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我本人就在這時期讀到烏格朋（W. F. Ogburn）的《社會變遷》而且深為折服，後來譯成中文，大約在1936年由商務書館列入世界名著叢書出版。我提到這些事是想藉以指出當時的中國社會學的主流是吸收西方的社會學。與此同時，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大量傳入中國，其中有一部份就用社會學的名義傳入的，但限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在大學裡所佔有的陣地不大。

三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國思想界較為活躍的時期，受過五四運動震動過的青年學生不可能滿足於不聯系中國實際的以引進

西學為主的社會學。我本人就是抱着了解中國社會，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願望踏進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讀了許多西文書本，對中國情況依然惘然無知，就不免焦慮不安。就在這種普遍的不滿情緒下，中國社會學出現了吳文藻先生首先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要求。因而開闢了另一個階段。

三

聯系中國實際講社會學和以社會學的研究來服務於中國社會的改革和建設，是「社會學中國化」的主要內容。在三十年代這可能是中國社會學的共同趨向。在這時期裡比較突出的有梁漱溟主持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主持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定縣實驗區，陳翰笙主持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無錫等地區農村調查。這些工作有些不一定用社會學這個名義，但事實上都主張聯系中國社會實際進行調查研究並以服務於中國社會為目標的。把他們歸入「社會學中國化」的範圍之內我認為是可以的。但我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沒有機會和這些工作有親自的接觸，所以對這些方面的具體情況我並不能在此詳細介紹。我所能補充的是當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在這方面的情況。燕大社會學系在「社會學中國化」上也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參加北平教會和鄉村建設的工作，並且在北京郊區建立清河調查實驗區；另一方面是在理論和方法上為以後的「社區研究」作準備工作。我本人是參與第二方面的一名小卒。

1933年是我在燕京大學裡學習的最後一年。正是這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派克（Robert Park）到燕京大學來講學。他是美國盛譽一時的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學的奠基人，主張理論應當密切聯系實際，而且提倡實地調查的方法：就是研究者必須親自深入社會生活，進行詳細觀察，親自體會和了解被研究者的行為和心態，然後通過分析、比較、總結事實，提高到理論水平。這種實地調查方法據派克教授說是從社

會人類學裡移植過來的。社會人類學用之於土著民族，社會學則用之於城市居民。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就是以這種方法研究芝加哥城市各種居民區而著名的。他也稱這種研究為 Community Study，我們把它翻譯作「社區研究」。

派克不僅在班上講解人類集體行為的性質和社區的結構，而且特別引起我們這些學生興趣的是他親自帶領我們參觀北京各種類別的居民區。這把我們帶出了風光明媚的未名湖的世外桃源，看到了天橋的貧民窟，甚至八大胡同的紅燈區，這真正打開了我們這些在象牙塔中生活的小青年的眼界。世界上原來有和自己生活區別如此之甚的各種各樣的生活模式和思想類型，真是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廣闊天地。我們這輩學生真感激他，把我們帶出了書本，進入了活生生的現實世界。

我們感激派克老師更重要的是在他給我們指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具體方法。只有這個願望是不夠的，必須掌握具體的操作方法。「社區研究」就是他給我們的這把鑰匙。同時更具體地告訴我們這套方法可以向社會人類學者去學習。圍繞了它這個主意我們一批學生包括楊慶堃、林耀華、黃迪、廖太初等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學術團體，在天津《益世報》辦了一個專頁附刊——〈社會研究〉，從 1933 年起直到抗戰開始才停止。我們還分別自己下鄉找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在我們小圈子裡形成了一個風氣。我則轉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史祿國老師，學習人類學，目的還是在尋找社區研究方法的根源。

1935 年，我去廣西瑤山進行實地調查這一年，吳文藻先生又邀請了英國拉德克利夫·布朗（R. Brown）到燕京大學來講學，布朗是人類學家，和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並稱的人類學功能學派的創始人。吳文藻先生請他來華講學就是聽從派克的指導，從社會人類學去學習實地調查的方法。布朗早年在印度洋的 Adaman 島上實地調查，後來以此為基礎在社會人類學里發揮他功能論的學說。而且和派克同調認為社會人類學實在

就是比較社會學。他在芝加哥大學講學時就用比較社會學為名講社會人類學。派克是從社會學這方面去攀近社會人類學，布朗則是從人類學這方面去靠攏社會學，一推一拉就在中國實現了這兩門學科的通家之好，名雖不同，實則無異。後來便形成了中國社會學的一個特色。

我們稱這種着重實地調查和比較研究的社會學作為「社區研究」，這也有個來歷。當派克教授離華時，我們這些學生建議出一本論文集以示紀念。在編輯這本論文集時，要用派克的一篇原著，而這篇原著裡有一句話，“Community is not society”。這把譯者卡住了。因為過去Community和society在漢文中都譯成社會，而用舊詞來翻譯這句話就不成話了。原來派克的理論中人際關係可分出兩個層次。基層是共存關係，和其他動植物一般通過、適應、競爭，在空間獲得各人所處的地位，相互間可以互相利用，維持生存，也就是我們普通說的利害關係，但人際關係還有一個層次性質不同於前者，就是痛癢相關、榮辱與共的道義關係。前者形成的群體是 Community，而後者形成的團體是 Society。他既然作出了這個區別，我們翻譯時也必須用兩個不同的名詞。社會一詞留給 Society，Community 不能不另找新詞。通過我們這輩學生的議論，最後創立了「社區」這個新詞。好得 Community 必須有地區為基礎如鄰里、村寨、鄉鎮、城郊甚至大至民族、國家都可以社區來表示，是一個有地域為基礎的人群。用「社區研究」這個名字還可以包括我們當時進行的農村和民族調查，所以就這樣用開了。

四

1937 年抗日戰爭開始，我那時還在英國留學，國內情況相當隔膜。1938 年夏季我回國時半個中國已經淪陷，當時原在淪陷區的大學相率內遷。原來有社會學系的大學內遷後有些還能繼續教學和進行研究工作，當時集中在西南的各大學中，北